

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变

王梦迪 吴越 刘智耿

2017年5月16日

1 简介

2 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观念

中华民族形成很早，但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，中国人持“华夷之辨”，以文化而非血缘传统来判定一个人的归属。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让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与此同时，西方的科学、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，其中就包括西方民族主义，这促进了中国本土民族主义的发展，而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导致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，将中华民族凝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，向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进行转变。

2.1 梁启超

梁启超是最早引进西方民族主义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和使用“中华民族”这一观念的人。1901年，梁启超发表了在《中国史叙论》一文。梁启超在文中称，“吾人所最惭愧者。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。寻常通称。或曰诸夏。或曰汉人。或曰唐人。皆朝名也。外人所称。或曰震旦。或曰支那。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。”可见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明确地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定义，只是模糊地进行代称。文中提出了“中国民族”这一说法，将中华民族这一传统上的文化观念视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。文中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：“第一，上世史，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，是为中国之中国，即中国民族自发达、自竞争、自团结之时代也”；“第二，中世史，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，是为亚洲之中国，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、繁赜、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”；“第三，近世史，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，是为世界之中国，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、竞争之时代也”。

1902年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中，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提出：“齐，海国也。上古时代，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。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：一曰国家观，二曰世界观。”在该文中，梁启超对“中华”的内涵做了说明：“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，谁乎？我中华也；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，谁乎？我中华也；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，谁乎？我中华也。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，世界莫能及。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，世界莫能及。”

1905年，梁启超在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一文中，使用了“中华民族”七次（简称为“华族”），并明确表示：“今之中华民族，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”，它是“我中国主族，即所谓炎黄遗族。”，由此可知梁启超主张中华民族就等于汉族，他将中华民族认定为汉族与其前身华夏族，这与今日的定义，即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。

梁启超为晚清君主立宪的改革派人士代表，反对鼓吹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党政治主张，主张将满清疆域境内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来拯救的“大民族主义”。梁启超将革命党政治主张描述成对立的“小民族主义”，认为“小民族主义”鼓吹汉族独立建国，从满清的统治中独立复兴单一民族。

2.2 杨度

继梁启超之后，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早期使用者。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《金铁主义说》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“中华民族”，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“中华”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：“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，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。今人必曰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，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，而非其民族之名也。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、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，自命其国曰中国，自命其民族曰中华。即此义以求之，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，别于地域，中国云者，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。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，别于文化，中华云者，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。”

杨度主张“汉”只是“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”，应采“中华”为“文化之族名”以反对“汉族”血统说。因此杨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，但其强调以中国自古以来以“文化较高、人数较多”的历史文化定义和梁启超的政治文化定义有所不同。杨度提倡中华民族为中华文化之族名，将中国全体人民尽成为中华民族。

3 中华民族观念的星期

“中华民族”这一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中，五四运动等反帝国主义运动的

产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契机。而在这一时期，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则主要来源于“民族自决”——让中华民族的人们不再受到外来侵略者的压制和侵犯，让人们真正享受到独立和自由。陈独秀先生，就曾经多次在他的讲话当中提到，“对外发展主义，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，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理的思想。但‘民族自决主义’（就是在国土之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），我们是绝对赞成的。”

随着一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，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，民族自决这一概念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。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，只有各个民族都团结起来，一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，从一定程度上，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从旧民族主义过渡而来的。他在1923年发表的《中国国民党宣言》里提到“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，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，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，完成一大中华民族”。

于是，随着民族自决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，“中华民族”这一词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，这也彰显这人们越来越不为血统的概念所羁绊，各个民族的地位都被同样地认可。这对于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团结，以及对于外来势力的抵御。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在当时的中国，一共有三大政治派别，国民党，早期共产主义者，研究系知识分子。而他们，对于“中华民族”这一概念的推广也做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国民党人以孙中山为代表。在清末，孙中山虽然发表过“振兴中华”的言论，却并没有使用“中华民族”这一称谓。而到了五四运动前后，他对于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使用就较为频繁了。1919年9月所著的《〈战后太平洋问题〉序》，10月所著的《八年今日》，以及同年(具体月份不详)所著的《三民主义》等文中，都使用过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在《三民主义》一文中，他对清末的排满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，认为如此的做法是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，根本无益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。真正的民族主义当如他所写，“汉族当牺牲其血统、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，而与满、蒙、回、藏之人民相见与诚，合为一炉而冶之，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”。在1920年的《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》中，他更是指出，“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，成个中华民族”。打倒帝国主义，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由，在他的鼓励与促进下，更是成为了国民党的基本纲领。

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代表是李大钊先生、陈独秀先生。在1916年，李大钊先生便在他的作品《〈晨钟〉之使命》中使用到“中华之民族”。在1917年，他又发表了《新中华民族主义》，针锋相对日本人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。而陈独秀先生则在《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》中明确使用中华民族，

直接触及问题的本质——中华民族本为一家。从他们对“中华民族”一词的使用来看，指的是中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，已经有很高的思想觉悟。而在他们的引导下，中国共产党在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中第一次正式地使用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该文也在文中犀利地指出，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，就是“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”。1926年，在《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》中，甚至出现了“中华民族解放万岁”的口号。由此可见，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对“中华民族”一次的传播使用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影响了共产党对这一词的接受和使用。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运动后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其对“中华民族”的使用无疑更让这一概念深入人心。

研究系知识分子，则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。事实上，他们对这一词的研究比前两者更早，也有更高的自觉。但离开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先生，已经不是从政治上来接受和使用“中华民族”这一词，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。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，他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否应仅仅指中国的原住民这样的有关“中华民族”形成和发展的重大问题。梁启超先生对于“中华民族”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考察和总结，他认为，开始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“华夏”或“诸夏”族群不仅是“中华民族之骨干”，而且具有很强的民族“同化力”，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，不断“化合”周边各族群，最终使“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，遂得以成立”。所以，中华民族“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”，所以，这么一说，中华民族自然应该具有“多元一体”的格局。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，自然应该成为一家。梁启超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，让他对“中华民族”的理解影响力很大，对“中华民族”这一词的传播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在五四运动前后，仍然有一些人认同的是“中国民族”，“吾民族”这样的词汇。而正是梁启超，李大钊，孙中山这样的人，率先使用“中华民族”这样的词汇，表达中国各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。

4 中华民族观念的加深和促进

民族主义当民族受到外部威胁和领土争议的时候变得极为重要，而在九一八事变以及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，民族危机日益加重，这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，而“中华民族”作为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统一的概念也开始高涨和流行。

4.1

4.1.1 this is subsubsection

References